

# 汉语量化表达的 语义来源及演变

董正存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 目录 | Contents

- 001 绪 论
- 001 一、研究对象
- 002 二、研究现状述评
- 017 三、研究内容和思路

## 第一部分 汉语量化表达的源语义范畴

- 021 第一章 “完结”到量化的语义演变
- 021 一、引言
- 022 二、“毕”“尽”等的句法表现
- 027 三、完结义动词发展出“周遍”义的演变过程及演变机制
- 033 四、结语
  
- 037 第二章 “序列”到量化的语义演变
- 037 一、引言
- 041 二、量化义由序列义发展而来
- 053 三、序列义向量化义演变的动因
- 056 四、结语
  
- 059 第三章 “初始/起始”到量化的语义演变
- 059 一、引言
- 060 二、否定词置于“初”“从(来)”“再”后所构成格式的用法

066 三、时间全量用法的来源与演变的动因

070 四、结语

071 第四章 成对反义语素的量化实现

071 一、引言

071 二、表达周遍的“是X是Y”格式

082 三、表达周遍的“若X若Y”格式

## 第二部分 汉语量化表达的发展与走向

096 第五章 无条件构式的省缩及其句法-语用后果

096 一、引言

097 二、无条件构式的省缩特点

103 三、无条件构式省缩引发的句法-语用后果

119 四、结语

121 第六章 让步条件构式的省缩及副词“打死”的形成

121 一、引言

122 二、“打死”让步条件构式的省缩特点

127 三、“打死”语法化的机制与动因

131 四、结语

133 第七章 结构省缩与情态依附

133 一、引言

136 二、汉语普适和量级这两种让步条件句的省缩特点

139 三、表量或构成量级的语言形式对情态敏感的原因

144 四、表量或构成量级的语言形式对情态敏感

147 五、结语

148	第八章 汉语中约量到可能认识情态的语义演变
148	一、引言
150	二、副词“多半”的可能认识情态用法
155	三、“多半”语义的历时发展
160	四、“多半”由约量发展出可能认识情态的机制与动因
164	五、结语
167	第九章 成对反义语素构成的情态副词研究
167	一、引言
168	二、反义语素构成的情态副词的历时考察及其情态化的原因
197	三、情态副词“反正”的语法化过程及其演变方向
203	四、结语
204	第十章 现代汉语表赞扬义的“有”字口语格式的用法及意义获得
204	一、引言
206	二、“有你的”和“有一套”的用法
212	三、“有”字口语格式获得赞扬义的过程及原因
217	四、结语
219	参考文献
238	附录 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的词汇系统
238	一、说明
239	二、叠加性全称量化表达的词汇系统
290	三、一体性全称量化表达的词汇系统
303	图表索引
304	后 记

# 绪 论

## 一、研究对象

“量”(Quantity)在人类世界中无处不在,在人类现实生活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事物、事件、性状等无不与“量”这个概念相关。事物中包含的量既可以体现为空间量,也可以体现为数量;事件中包含的量既可以体现为时间量,也可以体现为动作量;性状中包含的量既可以体现为量点和量级,也可以体现为程度量。在丈量和测定事物、事件、性状等时,人类习惯用“量”来作为判定的依据。将事物、事件和性状综合在一起,可以构成“量”这种能够反映人类现实生活世界的认知范畴。李宇明(2000:30)<sup>①</sup>指出,“‘量’是人们认知世界、把握世界和表述世界的重要范畴”,在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反映客观世界的“量”作为人类重要的认知范畴投射到语言中,就形成了语言世界中的量范畴(Quantification Category)。“这种认知范畴投射到语言中,即通过‘语言化’形成语言世界的量范畴。”(李宇明,2000:30)应该这么认为,“量”是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事件、性状的大小、时间、频次、范围、程度等进行认知聚合的结果,“量”的概念投射到语言中,即量范畴语言化,便形成了语言的量范畴这一认知语义范畴。语言中的量范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中的量范畴得以表述的重要前提。由于人类现实世界中的“量”具有不同的性质,相应地,语言中的量范畴也可以依据不同性质的量分别对应于空间范畴、数量范畴、时间范畴、频率范畴、程度范畴等,语言学中的这些不同范畴是人类对客观世界不同性质的“量”的归纳

---

<sup>①</sup> 本书按学界惯例,在文中引用他人著作时,将出版年与页码夹注其后。

与概括,这些范畴在本质上都具有量性特征,可以进一步向上合并出量范畴这一上位范畴。量范畴及其下位范畴在具体语言中的表达形式,可以概称为量化表达式。在具体的不同语言中,量化表达式有哪些种类、因何能够表达“量”、“量”如何具体指派与分配等,是语言学研究中应该予以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从本质上来看,“量”的存在方式可以分为全称量、存在量和相对量三种。“人们在表达一个命题时,对所陈述的对象一般要给出一定的量的范围,这个范围称为量限,表达量的范围的形式称为量限表达式。”(曹秀玲,2005:2)具体到汉语量限表达式的种类,徐颂列(1998)和曹秀玲(2005)都对此做过说明。徐颂列(1998:4)指出,“根据所约束的对象的范围,大体可以把现代汉语的量限表达式分为总括量限表达式、存在量限表达式和相对量限表达式三大类”。曹秀玲(2005:2)则将“以汉语全称、存在和相对量限的语义表达为切入点,逐一描写汉语各种量限表达的具体形式”作为研究目标,并从历时发展和类型学的视角对汉语量限表达进行了简要考察。由此可见,汉语的量化表达研究可以分为全称量化表达、存在量化表达和相对量化表达三个研究板块,这样做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摆脱对个体事物的单一陈述,将研究视角转向对一类或一组事物的类别陈述。通过对相关量化表达研究成果的查阅可发现,目前汉语学界在量化表达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且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 二、研究现状述评

作为语言基本范畴之一的量范畴,在语言研究领域一直以来备受重视和青睐。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在其《范畴论》中列出过“数量”这一逻辑范畴<sup>①</sup>,认为其是“实体”的属性之一,并将其列为众属性之首,视作其他范畴的基础。数量等逻辑范畴是哲学家对客观世界事物

---

<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所列的逻辑范畴包括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状况、具有、动作、承受,其中“实体”为唯一主体,其他范畴都是隶属于主体的属性。

属性的总结和概括<sup>①</sup>，人类语言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与此保持高度一致。李德鹏（2014）指出，客观世界是语言世界对物理世界的客观反映，物理世界和客观世界有所不同，物理世界是纯客观的，而客观世界属于语言世界，是语言世界中的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的，其客观性是人类一定认知能力下的客观。语言中也存在这些范畴，相应地，在语言研究中自然应该对这些范畴进行研究。吕叔湘（1942）在《中国语法要略》下卷之“表达论”部分罗列并说明了若干范畴，分别为数量、指称有定、指称无定、方所、时间、正反、虚实、传言、传疑、行动、感情，其中第一个范畴就是数量范畴。书中还对“数量”进行了探讨，指出可计量事物的数量根据是否确定分为定量和约量；语言中的数分为整数和分数、基数和序数。同时，吕叔湘指出，“量”性不仅存在于事物中，性状与动作中也可以包含“量”的特征，性状可以有程度量，而动作也可以有动作量。总体来看，该书实际上将数量范畴分为物量、程度和动量三种类别，且特别指出程度也是数量，“程度的差别也就是数量的差别”。数量表达手段除词语外，还有重叠、动补结构等语法形式或手段，这说明吕叔湘当时采用的是广义的量的概念。由此可知，以吕叔湘为代表的中国语言学者（主要是汉语学界）对数量范畴或量范畴的关注和研究比较早，且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

### （一）量范畴系统的研究。

针对中国语言学界的量范畴研究，赵国军（2009）做过研究综述。根据

---

① “数”和“量”是密不可分的两个范畴，因而时常连用，但本质上二者有所不同。“数”是数学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术语之一，也是最基本的认知和交际工具之一。起初，“数”应该与客观世界中的事物数目相对应，自然界中的事物有多少就会有相应的数与之对应，后来发展到从所有事物组合的群体中提取出共同的表示多少的因素，进而形成了抽象的数概念。在数学中，“数”的概念进一步深化，除了自然数之外，还有分数、小数、负数、有理数、无理数等。数又可分为基数和序数两类，前者计量事物的多少，后者排列事物的次序，相应地，语言中的数词也有基数词和序数词两类。上文已述，量是人们对于事物、事件、性状的大小、范围、程度等进行认知的结果。量的概念投射到语言中，即量范畴语言化，便形成了语言的量范畴。相比而言，数的概念更为抽象，而量的概念相对具体。数一般不限定和作用于事物，只计量事物的数目，而量则关涉事物的属性，如“时间”“空间”等。可见，“量”是人类观察和描述事物的一个认知维度。

我们的理解及研究需要,下面从研究特点、研究对象、理论取向等分类角度,将量范畴的研究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分界线是20世纪90年代。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语言学界主要以表达客观量的数词、量词以及数量组合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的语法专著大多设有专章讨论汉语的数词、量词以及数量组合规律等,文献众多,在此恕不一一列举。另外,对形容词、副词、动词的一些研究中也涉及了量的探讨。比如,朱德熙(1982)的《语法讲义》中就曾指出,汉语形容词的复杂形式中隐含着量,并且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李临定(1990)的《现代汉语动词》中把动词的量分为重复量和延续量两种。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量范畴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这一层面。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语言学界的量范畴研究在范围和研究对象上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研究重点开始从词汇层面向句法或句式层面转变,特别是对主观量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在研究取向上,也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语言现象的描述,而开始在描述的基础上试图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更为可贵的是,除了对汉语中的个案进行描述和解释之外,汉语学界也开始出现对汉语量范畴的体系框架的研究。

对量范畴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是李宇明(2000)的《汉语量范畴研究》一书。该书从纵、横两个维度对汉语量范畴的体系框架进行了全面建构。从纵向上来看,该书将量范畴分为六个次范畴,依次为物量、空间量、时间量、动作量、级次量、语势。物量计量事物的数量,在语言表达上主要与名词相关。空间量计量事物的长度、面积、体积以及事物间的距离,在语言表达上主要与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相关。事物、性状和事件都与时间量密切相关:事物、性状在时间中存在和变化,事件在时间中发生、发展和结束。动作量计量行为动作等的力度、涉及的范围、活动的幅度、反复的次数和持续的时长等。级次量是由于同一维度上量的差异或等级的差异而形成的序列。语势反映的是言语情感的量,不同的语势代表不同的言语情感程度。从横向上来看,该书根据量的表达方式,确立了明量与暗量、虚量与实量、确量与约量及主观量与客观量等四组相对应且对立的次范畴。该书遵循广义量的概念,极大地拓宽了量范畴的研究范围,为日后汉语学界量范畴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系统框架,指明

了研究方向,在汉语学界量范畴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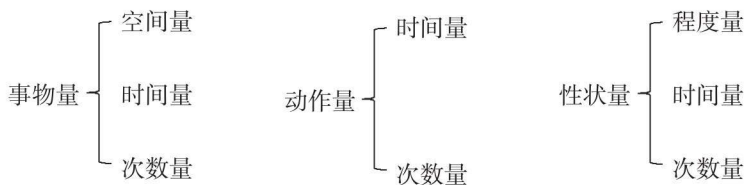
李善熙(2003)的《汉语“主观量”的表达研究》主要讨论主观量的表达,建构了主观量的表达系统。实际上,汉语学界关于主观量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就已经开始。熊正辉(1979)最早进行了主观量的研究;马真(1981: 53)指出“现代汉语里,有一部分副词可以用来修饰数量词,表明说话人对某数量的看法和态度”;施关淦(1988: 196)指出“时间副词‘就’一般不能单独表示时间,也不表示一定的时量。它只表示说话者对于在某时发生了某事,或将于某时发生某事,在时间方面的一种主观看法”。但真正让主观量的研究成为当时及日后研究热点的是陈小荷(1994)发表的《主观量问题初探——兼谈副词“就”“才”“都”》一文,该文明确提出了主观量的概念,同时指出语言表达的量包括客观量和主观量,主观量表达的是说话人对量大小的主观评价,“‘主观量’是含有主观评价意义的量,与‘客观量’相对立”(陈小荷,1994: 18),并从句重音、副词和语气助词三种不同的形式入手具体分析了“就”“才”“都”分别表达主观量的情况。王弘宇(1996)讨论了“仅,就”格式中的主观量问题。后来李宇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主观量研究方面的论文,如《主观量的成因》(1997)、《“—V……数量”结构及其主观大量问题》(1999)、《数量词语与主观量》(1999)等,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扩大了汉语主观量的表达手段或方式。更为人称道的是,除了在描写汉语主观量的表达之外,李宇明的系列论文试图对主观量的产生进行解释,这表明汉语学界已开始了研究价值取向的转变,寻求在详细扎实描述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合理的科学解释。沈家煊(2002)以“把”字句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结论为“把”字句往往带有说话者对受事量和程度量的主观性判断。真正系统化研究主观量的是李善熙(2003)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该文将量分为空间量、时间量和性状量三个次类范畴,它们分别对应语言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大词类。空间量主要和事物相关,包括事物的数量和事物的度量。时间量主要和动作相关,包括动作的持续量和动作的次数量。性状量包括事物的性状量和动作的性状量。同时,李善熙(2003: 10)提出:“主观量是语言的主观性在量范畴上的具体体现,人类认知不是被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量,而

是经常带有主观的感受、态度和评价,使客观量附加一定的主观性。”该文阐述了主观量和客观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强调主观量具有不同的程度等级,从语音、词汇、语序、复叠、语气等几个方面着重讨论了汉语中主观量的表达手段。轻重音、长短音、变音等语音手段能够表达主观量;“肯定与否定”“达到和不过”“接近、超过和不到”“连续、语义协同和语义应变”等反映这些概念的词语也能够表达主观量;语序的变换也能够表达主观量,其手段为语序的颠倒和凸显,由此可以造成主观量表达效果的不同;复叠主要有重复和重叠两种形式;语气词主要是通过句末语气词和语气副词来表达主观量。可见,李善熙(2003)把对主观量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李善熙建立了汉语主观量的表达系统之后,也有一些学者对汉语主观量的表达手段、主观量的分类进行了重新思考,并对“主观量”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如张谊生(2006)对“不”“没”“好”三个副词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认为这三个副词已完全主观化,具有标示主观量的功能;全湘燕(2007)根据主观量中“量”的大小将主观量分为主观大量、主观适量和主观小量三类,同时强调数量词语本身并不包含评价色彩,“评价是指对某一个确量或模糊量进行的量的满足程度的认定”(全湘燕,2007:159);刘承峰(2014)则对主观量的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他将“主观量”界定为量的“主观性”,并系统考察了量的“主观性”内部成员。关于主观量的研究现状及述评,彭彤彤(2018)从主观量理论研究、主观量标记研究、主观量结构式研究、与主观量有关的其他研究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介绍与述评,值得参考。另外,有关主观量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现代汉语这一共时平面,在汉语史和方言研究中也研究成果出现,如罗荣华(2008)对古代汉语中的主观量表达进行了系统研究,此外,他还有一系列有关江西方言主观量的研究论文。

曹秀玲(2005)的《现代汉语量限研究》一书,将汉语量限表达分为全称量限、存在量限和相对量限三类,并逐一描写了汉语各种量限表达的具体形式,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全面建构出现代汉语量限的表达系统。该书首先按不同时期(汉语语法草创和革新时期、汉语语法普及时期、汉语语法研究拓展时期)对汉语数量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随后以四章内容分别

阐述了汉语的三种量限表达类型。其中在讨论汉语全称量限表达时,以两章内容区分了汉语全称限定词、汉语全称量限结构和全称副词,可见汉语全称量化的表达手段相比于其他两类更为多样和复杂。接下来的两章分别从历时和类型学的角度对汉语量限表达加以考察,并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加以解释。

陈振宁(2006)的《现代汉语量范畴语义模型初探》基于对世界“事物、运动变化、状态”三种基本要素的认识,参照“量”的属性,将量范畴划分为事物量、活动量和性状量等上位类型,同时该文认为时间和空间“总是依附于上述三个要素之上”(陈振宁,2006:23);在三个次范畴下划分出时间或空间等下位类型,以数学模型的方式构建了汉语量范畴的语义模型,并对体词、动词、形容词、数量短语和程度副词等几类语言成分的量性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其所建构的量范畴的语义模型框架如图绪论-1所示。



图绪论-1 量范畴的语义模型框架

赵国军(2008)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变量表达研究》从类别和取值两个维度,将汉语的量范畴分为量类和量值两个下位次类系统。前者可分为语言的量和事物的量两种类型,区分标准为指涉对象是否在语言符号系统内;后者包括大小、次序、量限、比例四类。

## (二) 量范畴下位次类范畴的研究。

以上简要梳理了一些关于量范畴系统的相关研究,下面对量范畴的下位次类范畴的相关研究做一下介绍。

与汉语中全称量化表达手段丰富多样、全称量化较之其他两种量化类型更为显赫相适应,在量范畴下位次类范畴的研究中,全称量化一直是研究的

重中之重,其研究热度持续不衰,相应地,研究成果也最为集中、最为丰富。下面分别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对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的研究现状进行说明,以期通过对全称量化表达这一下位次类范畴研究现状的介绍与评述,以点带面地窥探和挖掘目前汉语量范畴这一上位大类研究的学术积累与学术贡献,以及其存在的不足。

总体而言,目前汉语学界对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现代汉语层面,对上古、中古、近代汉语层面则关注不多。现代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两个方面:现代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系统的建构;表达全称量化的具体格式或词语。后者的研究成果数量远远多于前者。

1.徐颂列(1998)和曹秀玲(2005)分别建构了现代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的系统。徐颂列将现代汉语总括表达式按总括方式的不同分为统指、逐指、任指和仅指四类,并对每小类逐一做了详细说明。其中前三类涉及汉语的全称量化表达,而仅指类与之并不关涉,所以在此不详述。

徐颂列(1998: 13—71)根据“条件”“断言”及“真值模式”的不同,将统指分为六种类型:统指A型、统指B型、统指C型、统指D型、统指E型、统指F型,并指出统指A型所占比例最大,且语言表达形式最为丰富。统指A型的语言表达形式可分为五种类型:①用单个词语表达,如“所有、凡、全3、完全1、一律、一致、一概、一切、统统、全部1、全体”等。②用成套词语表达,如“没有……(不)是……”。③用习用短语表达,如“天晓得、天知道、鬼(才)晓得、鬼(才)知道、鬼(才)相信”等。④用反问句表达,如“哪件事他对不起人? | 谁不说自己的孩儿好呢?”⑤用零形式表达,即在语言表层不带任何量限标记的统指表达式,如“美好的事物要辛勤的探索。| 共产党员应是执行纪律的模范”。统指B型是指汉语中“一齐”“一共”等表达式。统指C型指称的对象不是由个体组成的类,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有“整1、全1、通1、满1、一1、全部2、完全2”等。统指D型有“满2、全2、整2、一2”,它们与一个表示范围的名词或量词连用,构成名词或量词短语后再去修饰名词。统指E型有“总共、共、总”等。统指F型有“完全3、全4、通2”等。

关于汉语任指的语言表达形式,徐颂列(1998: 72—104)区分出六种类

型：用“任何”表任指；用“疑问代词+都（也）”表任指；用“无论（不管、不论、任、任凭）+疑问代词+都（也、总）”表任指；用“无论（不管、不论）+特定短语+都（也、总）”表任指；用一对不可逆用的反义词或反义短语表任指；用“反正、好歹、横竖”等词语表任指。

关于汉语逐指的语言表达式，徐颂列（1998：105—132）认为大致有三种：用“每”“各”“诸”“各自”等词语表示逐指；用名词或者量词的重叠形式表示逐指；用“一+名词（量词）”“一+名词（量词）重叠”或者“一”重叠表示逐指。

徐颂列（1998）已基本上建构出现代汉语的全称量化表达系统，这是汉学界较早全面系统地建构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系统框架的重要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系统还存在一些未臻完备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操作方法上，未能区分不同层面的全称量化表达手段。徐颂列（1998）提及的全称量化表达手段多为词汇形式，也有少量为句法格式，同时涉及了重叠（如名词或量词重叠、数词“一”的重叠）和语用（如反问）。可见，该书认为全称量化表达可以经由形态（构形）、词汇、句法、语用等多个层面来实现，这样的区分与操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些全称量化表达手段属于不同的层面，该书却未能条分缕析地按不同层次对其进行严格区分，而是将之胡乱地堆在一起，因而其所建构出来的全称量化表达系统略显杂乱，且表达手段的归类层次不清晰，内部不均匀。

其次，徐颂列（1998）将统指和整指都归入统指类中，并区分为统指C型和统指D型两类，这样做仅仅注意到了两种类型之间的联系，而未注意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语言上，这表现为统指通常由范围副词来表达，而整指一般由形容词来表达。统指侧重于强调通过涵盖集合内全部个体成员而涵盖整个集合，体现为叠加性的心理认知图式；整指则强调涵盖作为整体的整个集合，至于集合能不能分成不同的个体则并不关注，体现为一体性的心理认知图式。因而将这两类都放在统指类中有所不当。

再次，徐颂列（1998）所建构的全称量化表达系统中缺少“一+量+名”的

否定格式这一类,而通过对“一+量+名”进行否定来实现全称量化表达是汉语自古以来就有的重要表达手段。由于缺失了此类表达手段,所以其所建构的现代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系统就显得不太完备。

另外,该书将词汇形式称为“语言表达式”也有所不宜。词汇是静态层面的备用单位,而表达则是动态层面的使用单位,二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而且,表达式通常会由格式、句式或构式来充当,一般不会由词语来充当,这样操作会混淆词与格式(句式、构式)之间的界限。

除了徐颂列(1998)建构过现代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的系统外,曹秀玲(2005)也对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系统进行了建构,分别从全称限定词、全称量限结构和全量副词几部分对此系统做了说明。与徐颂列(1998)系统内部结构稍显混乱不同,曹秀玲(2005)所建构的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系统比较明晰。但是,在我们看来,曹秀玲(2005)所建构的全称量化表达系统也有一些不足:一是该系统只关注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虽然徐颂列的系统未能对不同层面的全称量化表达手段进行区分,但该系统基本上包含了从形态到语用的所有层面,而曹秀玲的系统则未涉及形态和语用两个层面;二是与徐颂列的系统一样,曹秀玲的系统也缺少通过“一+量+名”的否定进行全称量化表达这一类句法手段。

2.除了对全称量化表达系统进行建构的研究成果外,汉语学界研究表达全称量化的具体格式或词语的成果也数量众多,在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这些成果对表达全称量化的词汇小类都有所涉及,但以讨论统指类词汇形式的研究成果最为多见。

对统指类词汇形式的研究集中在“都”“所有”“一切”“全部”“一律”“一概”“凡”“凡是”等词汇形式上,主要讨论词汇形式的语义、语义指向和词汇形式之间的用法差异等内容。讨论统指类词汇形式语义的研究成果的主要有程美珍(1987)、谭敬训(1991)、徐颂列(1993)、蒋严(1998)、袁毓林(2004b; 2005a; 2005b; 2007)、肖双荣(2005)、周芳(2006)、彭小川和严丽明(2007)、张蕾等(2009)等;讨论统指类词汇形式语义指向

的研究成果的主要有马真(1983)、陈子骄(1995)、董秀芳(2002)、张谊生(2003)、詹卫东(2004)、朱峰(2005)、蒋静忠(2008)、刘宇(2008)、吴庚堂(2008)等;讨论某几个统指类词汇形式用法差异的研究成果的主要有徐颂列(1989a; 1989b)、赵宝珍(1998)、刘建东和任海波(2006)、崔显军(2007)、张传霞(2007)、李宇凤(2008)等。此外,也有人将某个统指类词汇形式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如方哲英(2007)。

对任指类词汇形式的研究集中在无条件连词和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上。对无条件连词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无条件复句句式,主要有赵淑端(1982)、尤俊成(1990)、黄晓冬(2001)等的成果;②无条件复句的语义特征,主要有田子徵(1983)、吕映(1992)等的成果;③无条件复句的逻辑意义,主要有王忠良(1990)等的成果;④无条件复句中的连词,主要有宋玉柱(1995)、陈淑梅(1998)、由丽萍和厉霁隼(2003)、侯瑞芬(2004)等的成果;⑤对无条件复句用法的表达提出质疑的,主要有汤贤均(1987)等的成果;⑥汉语“不管、无论、无论如何”的外语翻译及外语中“无论如何”的表达方法,主要有李波(1982)、谢职安(1994)、陈伟莉(1995)、罗应珍(2001; 2002)等的成果。讨论疑问代词非疑问用法的研究成果主要包含两部分:①对某个疑问代词任指用法的研究,主要有邵敬敏和赵秀凤(1989)、陶伏平(2002)的成果;②对疑问代词小类任指用法的研究,主要有玛琳娜·吉布拉泽(2005)、张尹琼(2005)、陈天序(2007)的论文等,此外还包括伍雅清(2002)对特殊疑问词非疑问用法的研究以及卫澜(1998)对疑问代词任指用法使用条件的研究。

对逐指类词汇形式的研究集中在“每”和“各”上,主要讨论词汇形式的用法差异,如刘月华(1979)、韩志刚(2002)、邢凤翔(2008)等。

对整指类词汇形式的研究集中在“满”、“全”和“整”上,其关注的内容主要为整指用法的差异,主要有储泽祥(1996)、丁雪欢(2007)、李文浩(2009)、罗天华(2016)、王泉(2018)的成果。

其次,对全称量化表达格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量+名”的否定格式和由疑问代词参与构成的全量表达格式上。对“一+量+名”否定格式进行

研究的有郭锐(1998)、李宇明(1998)、段朝霞(1999b)、倪建文(2001)、胡清国(2006; 2007)、白鸽和刘丹青(2016)等,他们主要讨论“一+量+名”否定格式的语义、焦点,格式中动词的配价,格式对量词的选择,“一+量+名”与否定词之间的两种语序及其制约因素,否定句全量宾语的语义解读。对疑问代词参与构成的全称量化表达格式进行研究的有于细良(1985)、胡盛伦和王健慈(1989)、杉村博文(1992)、温宾利(1996; 1997; 1998)、段朝霞(1999a)、全国斌(2002)、杨凯荣(2002; 2003)等,他们主要讨论由疑问代词构成的全称量化表达格式的句法形式,并对格式进行语义分析。

再次,对周遍性成分或周遍性主语句的研究中,有的研究周遍性成分的性质,如高顺全(1995)、陆丙甫(2003)等;有的研究周遍性成分的句法位置,如成海燕(2008)等;有的研究周遍表达中与副词有关的问题,如吴中伟(1995)、熊文(2007)、王玉丽(2008)等;有的研究周遍性主语句的表达类型,如陆俭明(1986)、谭馥(1995)等。

3.由上述可知,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的研究范围较广,研究角度较丰富,取得的成果数量较多,而在古代汉语或近代汉语共时层面上取得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

朱声琦(1985)讨论上古无指代词“莫”和“无”,汤建军(2001)讨论古汉语中的“皆”类词,曹秀玲(2005)讨论古汉语中的全称量限表达,李海霞(2006)讨论《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中的全称量限表达,羿采妍(2006)讨论先秦汉语的双重否定格式,这些研究均涉及汉语全称量化表达。古代汉语层面和近代汉语层面的全称量化表达研究多数散见于一些工具书、断代语言词典或专著中,多为对词汇形式的解释和说明,而对全称量化表达的句法系统则较少涉及。

与共时层面的研究相对火热、研究对象相对广泛的情况相比,从历时角度关注汉语全称量化表达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汉语全称量化表达在历时平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疑问代词任指用法的探讨。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始见于近代汉语,吕叔湘(1985)对此有过研究。冯春田(2000)指出任指用法是在“任(不